

中药饮片染色增重,救人还是害人?

社会热点

□ 洛谭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曝光了一批违法给中药饮片染色以达到增重目的的生产企业。通报称,在我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区 and 主要集散地安徽,药监部门查获了一批违法生产中药饮片的生产企业。8家严重违规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被责令停产整顿,6家被收回GMP证书,其中12家被立案调查。

消息公布,舆论哗然。“用化工色素金胺O进行染色、用铝盐和镁盐加重,并在药材中掺假”,这不就是一种故意投毒行为吗?理当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严惩。一边是价格高涨,一边是掺杂使假、以次充好,问题频发的中药材市场已“病”得不轻。

不久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中药材专业市场监管,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加工中药饮片、挂靠过票经营、人工染色增重等违法违规行为。此次曝光的相关企业违法行为,应该就是这次主动调查得到的结果。众所周知,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生产是中药生产、经营、使用的源头,通过染色增重的中药饮

片,会给后续的中药生产、临床配方使用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系统性安全风险。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拥有GMP证书的正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尚且如此,那些“三无”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企业,具体情况会如何?因为中药材市场价格较低,制药厂、中医院等购药单位往往直接从市场购进中药材,而不是从饮片加工企业等合法渠道购进饮片,给生产假冒伪劣中药材的厂商提供了空间,这被认为是危害中药安全的重要程序漏洞;可现在看来,这些所谓正规的饮片加工企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更让人害怕的是,下游的购药企业和用药单位似乎对中药材的质量

问题也没有一个可操作的质量安全检测标准,凭经验进行简单判断之外的现代质量监控体系是否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在购药时对价格的关注程度肯定远在质量之上,这就为中药材市场各种乱象提供了动机需求和操作可能。

虽然中药大多对外宣称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用药禁忌”等,用“尚不明确”四个字就足以打发;可是,如果中药材在源头上就是假冒伪劣猖獗、染色增重等潜规则泛滥,医生处方就算再高明,还能有满意的治疗效果吗?“是药三分毒”的风险能不几级递增吗?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有近

400种中西药复方制剂,也就是中药添加西药成分制成的中成药。本来,如果自信中药具有确切治疗效果,添加西药成分无异于自打耳光;关键原因就在于,几分钱一片的西药添加到中药里,价格往往可以提高上百倍。此即所谓“西药负责疗效、中药负责利润”。我们当然无意贬低中药,但是,当中药材承担了太多给药商赚钱的责任,甚至药商可以为了暴利而无所不用其极,中药材还能承担得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吗?

毋庸讳言,如果监管不能跟上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以至于中药材本身就“病”得不轻,祖宗留下来的中医精髓也只能无计可施——这不仅是中医的悲哀,更是患者的不幸。

画中有话

□ 文/刘昌海 图/王成喜

南京市民丁先生存款时被ATM机吞去1万元,他当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后被告之要等2个工作日才能处理。随后,丁先生打电话致电客服,假称机器多吐3千元,5分钟后客服便赶到。银行解释称,吞了客户的钱,这钱在机器里还是安全的,但机器多吐了钱,就会影响现金安全。

丁先生谎称机器多吐了3千元,客服5分钟便赶到,说明银行的客服有这样快速反应的能力。既然如此,客户的钱被吞了也应该按相同的流程走,而不是等2天之后对完账再说。

相信对于类似事情的处理银行确实有明确规定,接电话的工

作人员只不过是照章办事。但银行在处理问题时只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客户的利益,自己的钱出了问题就十万火急立马赶到,客户的钱出了问题就一板一眼不慌不忙,这样的“选择性服务”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

银行的霸王条款我们平时见得多了:柜台上写有“离开柜台,概不负责”的提示,储户当时没数清少了钱只能自认倒霉,但如果银行多付了钱,不管多长时间、不管跑多远都要追回来。储户存零钱数额太大耽误了银行的时间,银行要多收一部分“数钱费”,而客户去银行办点业务一等就是半天,银行则从来不说给客户付点“等候费”。储户和银行之间,从来就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

银行的钱是钱,客户的钱也是钱,甚至从职业道德上讲,银行

“吞吐”有别



作为服务者,理应把客户的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现在银行自己的利益比天还大、储户的利益比针尖还小,这是本末倒置。如果

某些银行总是这样一副大爷爷做派,将来难免不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砸掉的还是自己的饭碗。

权利与担当是师道的两面

□ 余宗明

舆论场里,纷繁杂乱:围绕教师节收礼的讨论,再度泛起,俨然是间歇性迸发的“口水岩浆”,如9月8日,在以“师爱无尘”为主题的北京某公益活动上,有教师提出“今年过节,只收心意不收礼”的口号,200多名教师响应;关乎教师权益的话题,也不少见,如官方又表态“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公务员”;还有讲述云南彝良地震中,代课教师用手刨出7名学生的。而礼赞教师、打量师德、以教师节为消费噱头等做法,也充塞于公众的眼界。

抒情与审思,褒扬与贬抑……众声喧哗,是教师节里挥之不去的风景。某种意义上,教师节就是个价值碰撞的现场:教师的职业道德、价值观念、生活境遇、权利尊严等,链接着教育的细节践行,通向孩子的心灵启蒙。他们被裹着厚重的“意义外衣”,接受着整个社会的审视和评说。

“最美女教师张亚莉舍身救人”“女教师邓丽一人改变一座学校”等,无不令人感动;可学术不端丑闻等,又时常让人嗤之以鼻。教师关心学生、耕种桃李,已是校园中的常态景象;可未曾绝迹的体罚学生、有偿补课等现象,又总是动辄得咎。教师是“辛勤园丁”,为教育事业蜡炬成灰,可个别时候又是道德失范者;他们或被人们尊敬,但也可能只是被边缘者……教师,是他们共同的身份符号,也是他们的“道德负累”。

不可否认的是,加诸教师身上的许多矛盾面,并非偶然。在现实条件下,教师独立人格、人文情怀、个性化思考的保全,或许会遇到不少“拦路虎”。他们的前行,也随时而会陷入彷徨和无奈;他们的作为,或是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在程式化教学中,生活格式化,有时会让他们的心情罩上一层阴霾。

而今,教育投入的增加、教改的渐进,在释放着积极信号。在日趋公平、合理的教育生态中,教师处境,也在不断改善。但在乱收费、学术造假等教育症结频现的情境下,教师也极易成舆论的“靶心”,哪怕许多人都是无辜的。指向他们的,往往是抽象批判的矛头,而不是体恤与包容。

当师道尊严变成“易碎花瓶”,教师们的背影,难免染上几分苍凉;他们承载的教育期许,也太过沉重。他们像是社会的“精神灯塔”,照亮了很多人,却也不起眼。当他们负重前行,又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守望者”“指明灯”——完整的尊严,是拥抱责任的前提。

“钱场”买不来“人场”

□ 付瑞生

近来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游客在全球不受欢迎游客排名中居次位,另一国际组织对全球游客的形象评价,中国游客形象位列倒数第三。

这两个调查组织的排名未必可信,但是中国游客一直以来名声不佳却是目共睹。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有不少的提升,但是整体仍然未有大的改观。不遵守秩序、随地吐痰、不冲洗手间、大声喧哗、插队、闯红灯等等依然饱受诟病。这其中当然有欧美人士对刚富起来的国人的偏见,但是

当年柏杨写就的《丑陋的中国人》对此也早有抨击。国民性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

说起来令人忧伤,如报道所说,大多欧美商家欢迎中国游客冲着的都是“钱场”,不是“人场”。也就是说他们尊重的是金钱,而不是国人的文明、礼仪和品位。有人说,这是因为国人素质低。其实这不客观。更准确的说,是国人的公共意识还没有与现代文明接轨。

从历史上看,历史研究表明,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表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从日本和韩国对中华

礼仪的传承中就可以看出。明中叶以后,游民越来越多,游民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自此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在当下,各级学校缺乏市民课和公民课。城市化速度一日千里,但是市民化的过程却行动迟缓。有些不文明举动,例如不排队、不冲厕所属于缺少市民意识,而有些行为,例如有些官员出国摆“官架子”,在教堂寺庙行为不检,酗酒猜拳行令等等就属于公民素质不高。

看上去都是“小节”,却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国人嘴上常说的人生哲

学是:“脸皮厚,吃个够”“规矩都是人定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这些所谓的“成功哲学”在国内吃得开,但是拿到国外,只能遭人白眼。因为它们侵犯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对规则程序、公平正义的认同。

有业内人士称,如今的中国游客和当年的日本游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随着彼此沟通交流更多,情况会有所好转。其实大可不必。要想既买来“钱场”也引来“人场”,在家里先学做一个好市民和好公民,无需劳师远征。

那些被“补上”的课桌

□ 然玉

9月8日,麻城市顺河镇部分小学生扛着课桌上学的情况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麻城市政府决定,在地方财政原已投入400万元的基础上,再筹措500万元专项资金,一次性解决课桌椅问题,同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开展认捐活动。据介绍,截至9月7日,麻城市顺河镇3000名自带课桌上学的学生,全部用上了新的标准课桌椅。全市党员干部已认捐26万余元,为学生购置新课桌。

一段悲悯的故事,总算有了个不错的结尾。当然,若置于长远视野考

量,那些偏僻之地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未来,仍有待观察。舆论的关注,追加的拨款,或可解燃眉之急,或可息一时之怒,但终究算不得治本之策。因为,如你我所知,“扛课桌上学”,实则只是诸多教育缺憾之一。

发展教育事业,若本着“曝光一事解决一事”的思路,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诚然,在湖北麻城,“扛课桌”曝出后,当地职能部门反应之快,行动之有效,令人激赏;极短时间内,不仅风口浪尖的“顺河镇”,配齐了新课桌,且整改的风潮,深度扩散到“全市”层面,也算做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但公众也当看到,它有着明显的局限

性——仅以“课桌添置”为诉求。名曰“专项行动”,实质上也是“点到即止”。

值得注意的是,课桌添置过程中,当地还开展了广泛的“干部认捐”活动。这一方面说明,当地官员具备可观的善意基础;却也昭示出,“课桌经费”未必事先走进“财政预算”。可依靠临时拨款、发动爱心等“应急”手段,到底能换回怎样水准的教育条件?又能将之维持多久?“围观改变现实”,而当“观众”离场,事情会否又故态复萌?

课桌风波,解剖维度是多面的。有人看到舆论的力量、职能者的行动力,有人看到基础教育资源的缺位。其实,即便换上“新课桌”,诸如顺河镇

等落后地域,部分学校的软硬件配置,也远谈不上“合格”;且不说师资、膳食等高阶要件,起码的安全校舍,在很多“穷乡僻壤”,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自扛课桌到标配课桌,麻城的变化,让公众见识到“监督的力量”。然而,推进教育的地域平等,不能只靠媒体曝光。从相关信息的收集,到补漏式的纠偏,乃至事先的以预留财政为核心的主动介入,都理应是教育管理体系内程序化、自觉性的行动。在此角度上,这起课桌风波的转向参照意义有限,本质上,它仍是被动的“应激反应”。